

法顯，比玄奘早 200 年的取經人

法顯（337年—420年），東晉高僧，是中國第一位到海外取經求法的大師，收集了大批梵文經典，前後歷時14年。晚年著《佛國記》，記錄邊疆地區及途經佛國的風土人情，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。

一部《西遊記》，令唐僧玄奘西天取經的故事家喻戶曉。其實早在玄奘西行的200多年前，東晉高僧法顯就已踏上了前往印度取經的道路。

玄奘向印度出發時，年方29歲；而法顯從長安出發時，已經62歲。這位年邁的老僧，歷經14個寒暑，途經30余國，行程約5萬里，終於在76歲時攜經東歸。

在晚年，法顯記述西游歷程，寫成《佛國記》一書。這是我國古代第一本系統介紹西域諸國風情的旅行記，更是後人西行求法的指南。

亂世佛心

東晉咸康三年（337年），法顯出生在山西平陽（今山西臨汾）一戶農姓農民家中。因為之前的3個孩子都因瘟疫夭折，父母為保住這個孩子，在3歲時將他抱進仙堂寺寄名出家，寺僧為他取名法顯。

由於法顯年歲太小，寺僧讓他暫養家中。有一次他生了重病，行將不治，父母送他到寺院，一夜之後病就好了。10歲時，父母相繼離世，孤獨無依的法顯來到仙堂寺正式出家。

當時的中國北方政權更迭，諸國混戰，百姓流離失所，朝不保夕。有一年秋天，法顯與師兄弟們收割田中稻穀時，來了一夥手持刀棍的饑民。他們一哄而上，要把割下的稻穀搶走。僧眾上前阻攔，饑民們以刀棍揮舞相向。僵持不下之時，法顯走上前去。

法顯說：“你們一定是沒有飯吃才出來搶劫的，出家人慈悲為懷，你們需要稻穀儘管拿吧。但你們知道為什麼會貧窮饑餓嗎？這是因為你們以前沒有廣行佈施，現在又搶奪稻穀，來世更將不堪設想，我真是替你們擔憂啊！”

聽了法顯的話，饑民們面面相覷，隨後悄悄離去。法顯臨危不懼，僧眾無不嘆服。

法顯20歲時，正式受具足戒，成為一名真正的比丘僧。在研習教典的過程中，他深感律藏殘缺，有很多疑惑無法得到解答。

而此時，外界環境愈加惡劣。淝水之戰後，失敗的前秦再次四分五裂，長安也燃起戰火。之後，豪強吳玠聚眾起事，立僧人法長為後燕國的皇帝，裹挾十萬僧俗，禍亂河北，為害一方。

亂世中的這些現象，令法顯深感困惑。怎樣的佛法才能救民於水火，真正普度眾生？他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，沒有完整的律藏，就無法有效約束僧眾的行為。

東晉隆安三年（399年），這位花甲之年的老僧決定從長安出發，西行前往佛國天竺

（今印度），求取完整的戒律。與他同行的，還有慧景、道整、慧應、慧鬼4位僧人。

為法西行

法顯5人由長安出發，曉行夜宿，一路西行，取道河西走廊，經過南京至北京，順利到達張掖。適逢張掖大亂，西去道路不通，北京王段業發心護持供養法顯一行，在此結夏安居（指印度佛教和尚每年雨季在寺廟裡安居3個月）。

在張掖期間，受法顯影響，寶雲、智嚴、慧簡、僧紹、僧景也加入進來，隊伍擴大到10人。

他們結伴西行，來到位於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。出敦煌後，法顯與寶雲等分頭前行。大漠流沙，氣候酷熱，上無飛鳥，下無走獸，只能以偶爾見到的枯骨作路標，靠看太陽來辨認方向。後經鄯善國（今新疆鄯善）、焉耆國（今新疆焉耆），法顯又與寶雲一行重逢。

因為缺乏資費，智嚴、慧簡、慧鬼轉向高昌國（今新疆吐魯番）化緣。法顯數人則繼續向西南前進。在杳無人煙的沙漠中走了1個多月，一行人終於到達于闐國（今新疆和闐）。不久，慧景、道整先行出發前往竭叉國（今新疆塔什庫爾幹塔吉克自治縣），法顯等人為觀看像盛會（佛誕日期間，抬佛像遊行），在於闐國滯留了3個月。

行像盛會結束後，僧紹跟隨一位胡僧去了罽（音同“繼”）賓國（今喀什米爾一帶）。法顯等4人南行到達于魔國（今葉爾羌河中上游一帶）結夏。其後翻山越嶺，走了25天，到達竭叉國，與慧景等人會合。

東晉元興元年（402年），法顯一行繼續向西南前進，他們戰戰兢兢地攀過雪山上由700多個臺階組成的簡陋梯道，踏踏繩橋，越過印度河，到達烏菴國（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脫河流域）。

他們繼續南下。其間，僧景、寶雲、慧應先行回國。法顯和慧景、道整3人則前往那竭國的薩羅城（今阿富汗賈拉拉巴德）過冬。

元興二年（403年），他們再度向南出發。翻越雪山時，慧景發起高燒，渾身無力。法顯與道整面對茫茫雪山，束手無策。慧景自知下不了山，多次以微弱的聲音勸法顯與道整快點離開。他對同伴說：“你們一定要取到佛經，國人在等待啊！”言訖而卒。法顯、道整號啕大哭，用白雪掩埋了慧景的遺體，揮淚向山頂攀登。

翻越雪山後，法顯與道整又經過30餘個小國，終於到達中天竺。道整想到國內戰禍頻仍，對法顯說：“千辛萬苦來到佛國，我想在這裡度過餘生。”法顯說：“佛國秩序好，是因為大家都遵守佛陀的經律。如果我們把經律帶回加以弘揚，我們的國度也會成為淨土啊！”

告別了道整，法顯獨自一人繼續前行。他

走到王舍城附近的靈鷲山，聽說這裡是佛陀說法的地方，欲前往朝拜。有人提醒他：“晚上不要上山，曾有人被黑獅子吃掉，明天再去吧。”

法顯說：“我歷盡艱辛，不遠萬里來到佛國，只為朝拜聖跡，求取佛經，佛菩薩會加持我的。”他來到靈鷲山上，對著聖跡焚香禮拜，禪坐誦經。夜裡，果然有3只黑獅子跑來，蹲在法顯面前，舐唇搖尾。法顯對獅子說：“你們如果餓了，就吃掉我吧；如果不餓，就放我去求法吧。”話音未落，獅子便起身離開了。

次日清晨，法顯下山時，迎面走來一位老僧，服飾素雅，神韻清峻。法顯暗暗稱奇，但並未在意。隨後，又遇到一位上山來的年輕僧人，法顯問：“剛才那位老僧是誰呀？”年輕僧人答：“他是頭陀摩訶迦葉，是佛陀的大弟子！”法顯猛然省悟，返身追趕，卻只見橫石阻擋，不見老僧的蹤影。

之後，法顯來到摩竭提國（今印度南比哈爾邦）南天王寺。法顯在寺中生活了3年，學習梵文，抄錄了《摩訶僧祇律》《方等般泥洹經》（簡稱《泥洹經》）等多部經典。其中，《摩訶僧祇律》是佛陀在世時大眾共同奉行的法規，後來形成的十八部律，均由其衍生而出。

在印度，法顯還遊歷了很多佛跡。他特別來到菩提伽耶，頂禮了那棵見證佛陀成道的菩提樹。在菩提樹下，法顯發願，一定要把佛教律經帶回中國，發揚光大。

當時的印度佛教，分成大乘、小乘兩大派系。法顯前一段抄錄的主要是大乘經律，而小乘則興盛于師子國（今斯里蘭卡）。為詳細瞭解兩派經律的義理，東晉安帝義熙五年（410年），法顯跟隨商船搭隻，渡海來到師子國。他用兩年時間，毫不懈怠地搜集佛典，其間最大的收穫是抄錄了《彌沙塞律》《長阿含經》《雜阿含經》《雜寶藏經》等經典，這些都是中土舊日所無的大小乘三藏中的基本要籍。

攜律東歸

身處異國十幾載，法顯常常思念遠處的祖國。有一次，他看見商人用晉地出產的白團絹扇供奉佛像，不覺淒然淚下，沾濕衣衫。

義熙七年（412年），法顯攜帶求得的佛像、佛典搭乘商船泛海東歸。想起當初同來的十餘人，有的留在途中各地，有的已經去世了，虔心取經並得以東歸者，只剩他一人，悲慨之情油然而生。

商船中途遇上暴風，海水灌進船艙，眾人惶恐不安，趕快把雜物投入海中，以減輕船的載重。法顯將佛典、佛像緊緊抱在懷中，一心念著觀音菩薩。商船漂流了十幾天，來到耶婆提國（今印尼爪哇島），法顯在此又住了5個月。



義熙八年（413年），法顯再次搭乘商船前往廣州，途中又遭遇了暴風。同船的商人都很恐懼，有人說是因為船上坐了和尚，才會遭此大難，合謀要把法顯推下海去。船主厲聲呵斥那些人說：“你們若把這個和尚推下海，先把我推下去。漢地帝王奉佛法、敬僧人，如果你們害了他，一定會治你們的罪。”商人們相視失色，只好作罷。商船在海上漂流了80多天，到達青州長廣郡的嶗山（今山東青島）一帶。

青州太守李暹遣使將法顯迎請到郡城，熱忱款待。在郡城住了一陣，法顯想回長安，李暹以北方戰亂為由勸阻。法顯說：“貧僧歷盡萬難，返回故地，只為弘揚律法，志願未伸，不能久留。”

義熙九年（414年），法顯南行來到建康（今南京）。在道場寺，法顯與天竺禪師佛馱跋陀羅合譯出《摩訶僧祇律》《泥洹經》等6部、24卷經律論，近百萬言。隨著律經的不斷譯出，漢傳佛教的戒律逐漸完備，僧人有了嚴謹的行為規範，為佛教的健康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

法顯譯出的《泥洹經》，曾廣為流布。長安有戶人家，抄寫了一部《泥洹經》讀誦供奉。由於沒有多餘的房間存放經書，主人就將《泥洹經》與其他書放在一起。有一天，房屋失火被毀，唯《泥洹經》儼然自存，連封面都沒有燒壞。人們無不感歎經書的神奇。

譯經之餘，法顯回顧了自己九死一生的求法之旅，穿越南北朝的戰火烽煙，攀登形如絕境的雪山，越過枯骨指路的沙漠和驚濤駭浪的大海……他深感此番見聞也很有價值，於是撰寫了一部《佛國記》（又稱《法顯大師傳》），記錄了他的求法經驗、見聞及遊歷各國的風土民情、佛教狀況，為後人西行求法提供了指南。

元熙二年（420年），法顯在荊州（今湖北江陵）新寺示寂，終年83歲。近代學者梁啟超評價法顯的功績時說：“法顯橫雪山而入天竺，齎（音同“機”）佛典多種以歸，著《佛國記》，我國人之至印度者，此為第一。”

唐太宗，無情殺兄弟有情為慈父

唐太宗李世民（598年—649年），唐朝第二位皇帝，傑出的政治家、軍事家，在位期間曾開創貞觀之治的繁榮安定局面。

天家最無情，似乎已成公論，唐太宗李世民一直被認為是其中代表。西元626年7月2日，長安城發生了玄武門之變，李世民殺死長兄皇太子李建成、四弟齊王李元吉及二人諸子，隨後唐高祖李淵召立李世民為太子，李淵不久被迫退位，李世民即位，改元貞觀。

但縱然如乃兄殺弟的李世民這樣的人物，對兒女也多有憐愛之情。“二十四史”之中的《新唐書·列傳第八》曾有一篇有關李世民第十九個女兒晉陽公主的小傳，就顯示出一個完全不一樣的太宗皇帝。

晉陽公主，名明德，是長孫皇后所生。長孫皇后一生最受李世民寵愛，貞觀十年(636年)長孫皇后去世時，晉陽公主年僅兩歲。當時在李世民諸子女中，時封晉王的李治和晉陽公主最小，李世民帶在身邊親自撫養。晉陽公主也是有史可考的唯一一位被皇帝親自撫養的公主。

李世民對這位公主的寵愛從其封號“晉陽”可以看出。唐朝大多數公主都是以地名為封號的，如襄陽公主、平陽公主等。但“晉陽”對初唐而言有著特殊意義，《舊唐書·地理志》記載晉陽是李唐龍興之地，高祖李淵曾言：“朕起義晉陽，遂登皇極。”李世民親歷隋亂，起兵反隋，視晉陽為大唐根基所在，將女兒封號晉陽，可見對愛女的重視。且據史書記載，初唐公主封邑上的實封一般只在出嫁時才能得到，但晉陽公主一早就有了實封。白居易雲“近代或有未笄年而賜湯沐者，亦如公主之號，以寵重之”，說的就是晉陽這樣的公主。

晉陽公主性格溫婉，李世民常將她抱在懷裡批閱奏章。長大後，晉陽繼承了父親的嗜好，酷愛書法。她最喜歡臨摹父親的“飛白書”，甚至最後達到了以假亂真的地步，連大臣們都看不出來。李世民脾氣剛烈，每遇被大臣觸

怒時，晉陽公主必看著父親的臉色“合宜時為之緩頰”，朝臣也多受其惠，因此都喜愛這位小公主。而且，唐太宗外出巡幸都會帶上晉陽，每次經過皇后生前所游之地，便會告訴女兒，公主聽後，總是不勝哀傷。

晉王李治和晉陽公主關係密切。他每次出宮去，晉陽公主都要一直送到度化門，流淚作別。李治成年，開始穿朝服上朝，公主流泣說：“哥哥現在也要和大臣們一樣，不能再留在宮中了嗎？”這個聰慧的女孩兒，很是明白兄長再不能如以前一般和自己在一起嬉笑遊戲了。李世民見此景，也為之流淚。

晉陽公主死時年僅12歲。李世民因此一個多月飲食無常，每天哀傷幾十次，為此消瘦許多。群臣勸慰，李世民說：“我怎會不知道如此悲傷沒有意義呢？只是不能自禁而已，也是沒有辦法啊！”他下詔給有關官員，用公主平日用度所剩的錢，在其墓旁修建佛祠紀念。

北宋的莊綽在《雞肋編》中寫道，太宗曾見大臣長孫順德因喪女而生病，認為他沒有男子氣概，還嘲笑他說：“順德無剛氣，以兒女牽愛至大病，何足恤！”而到了自己身上卻有過之而無不及，完全忘了“無剛氣”之語。可見，此時的李世民不是那個高高在上的千古一帝，而是痛失心愛女的普通父親而已。《新唐書》中晉陽公主的小傳不過200字，其中“涕”“泣”字出現了三次，兩次是公主泣，一次是太宗為公主泣。古文講，有淚無聲謂之泣，都是傷心到了極點。

李世民給晉陽公主起的乳名是“兕子”（?兕音同四?）。太宗的子女乳名記入史冊的，也只有李治（乳名“雉奴”）和晉陽。“兕”在古文中被認為是與犀牛同類的另一種動物。根據山海經說法，兕的出產地在湖南東南，大約廣東、福建等地，體形與牛相仿，十分兇猛壯碩，且有獨角。李世民為女兒取“兕”為小名，必是出自愛女之心，希冀她能夠遠離一切不測和疾病，像兕一樣頑強，健康成長。

風俗，穩固邊疆，最終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。貞觀之治為後來全盛的開元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礎，將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推向鼎盛時期。

因為親眼目睹隋朝的興亡，所以太宗即位後常用隋煬帝作為反面教材，來警誡自己及下屬。他與孟子一樣，把人民和君主的關係比作水與舟，認識到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」，因此留心吏治，選賢任能，從諫如流。他唯才是舉，不計出身，不問恩怨。在文臣武將之中，

或許自幼失去母親的晉陽，身體一直不是很好，作為父親，李世民希望她能夠如同小犀牛一樣強健吧，這比他對於女兒容貌德行的希望更為強烈。民間還有一個說法，將名字起得賤一些，閻王的生死簿上是不好意思寫上的，或許李世民也有此心。此時的李世民，似乎忘掉了自己的天子地位。

論唐太宗的政績，他無愧千古一帝，但近代儒家學者“厚黑教主”李宗吾則認為，李世民的人格達到了厚黑學的極致。理由就是玄武門之變李世民殺兄長建成、弟元吉，還逼迫李淵退位，之後粉飾史書，所以他以為李世民可謂厚黑學到極點，才得以獨掌霸業。但也有人認為，李宗吾的厚黑之說，終是有點書生氣。李世民祖上被認為是胡化嚴重的漢人，或是漢化嚴重的鮮卑人，李唐王室因此帶有強烈的遊牧民族傳統。草原各族，以狼為圖騰，從冒頓單于鳴鑼殺父開始，並不認為兄弟相殘是大逆不道的。他們推行的是原始的“達爾文主義”，以戰死為吉利，子繼父妾也是常理。所謂的兄弟弟恭，是儒家的教誨，用此理要求李世民，根本不對題，甚至從這個角度說，如今看起來的唐朝上層的所謂論理混亂，在唐人看來，或許也如同人要吃飯睡覺一樣自然。當然這樣的解讀也未必正確。

李世民的人情味兒一面，不僅表現在對待女兒上。《舊唐書》還曾記載了李世民同其妹丹陽公主的一段故事。丹陽公主嫁給了猛將薛萬徹。但薛萬徹為人粗魯，丹陽公主羞于與之同席，夫妻感情有了問題。太宗知道後為了給妹妹調解家庭矛盾，於是召集公主駙馬們饗餐，席間故意讓駙馬們用自己的寶刀為賭注比武，並暗中示意大家輸給薛萬徹。結果寶刀落入薛萬徹之手，丹陽公主這才覺得夫婿也是個大英雄，自己很有面子，於是“喜，命同載以歸”。

在丹陽公主面前，太宗就是一個有情的兄長，在晉陽公主面前，則是一個有愛的父親。

魏徵當過道士，原是太宗長兄太子李建成的舊臣，曾議請謀殺太宗；尉遲恭做過鐵匠，又是降將，但都受到重用。太宗鼓勵臣下直諫，魏徵前後諫事二百餘件，直陳其過，太宗多克己接納，或擇善而從。魏徵死後，太宗傷心地說：「夫以銅為鏡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為鏡，可以知興替；以人為鏡，可以明得失。魏徵逝，朕亡一鏡矣。」

唐太宗在經濟上特別關注農業生產，實行均田制與租庸調制，「去奢省費，輕徭薄賦」，使人民衣食有餘，安居樂業。在文化方面，



這些和渭水橋樑退突厥十萬精騎的機變，玄武門的陰謀一樣，同為李世民的本色。

則大力獎勵學術，組織文士大修諸經正義和史籍；在長安設國子監，鼓勵四方君長遣子弟到來留學。此外，太宗又屢次對外用兵，經略四方，平東突厥、定薛延陀、滅高昌、併西域，使大唐國威遠播四方。太宗則被西北諸國尊為「天可汗」，成為當時東方世界的國際盟主。因此貞觀年間（627年—649年），在君臣的共同努力下，出現了一個政治清明、經濟發展、社會安定、武功興盛的治世，史稱「貞觀之治」。

貞觀之治

唐太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代英主，其治績一直為後世所傳頌。太宗任人廉能，知人善用；廣開言路，尊重生命，自我克制，虛心納諫；並採取了以農為本，厲行節約，休養生息，文教復興，完善科舉制度等政策，使得社會出現了安定的局面；並大力平定外患，尊重邊族